



胡炳文烈士

这位抗美援朝女烈士 为啥会有三个名字？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庞国翔 何镇静

重庆市江津区有抗美援朝女烈士3名，分别是杜锡扬、吴嘉元和胡炳文。

其中，胡炳文又名胡秉文、邹开文，为何她会有3个名字？

翻开《江津县志》和《四川省江津县革命烈士英名录》等史料，我们一探究竟……

在1983年12月出版的《四川省江津县革命烈士英名录》中，我们发现第1页与第66页，记载着两位姓名相近的烈士——“胡炳文”与“胡秉文”。二者姓名读音相同，仅中间一字不同，且部队编号、职务和牺牲年份等信息高度相似，唯籍贯不同：胡秉文属几江街道，而胡炳文则属李市镇。

两人是否为同一人？疑惑初现，却又很快被打消，因为同名同姓者本就常见。为慎重起见，我们查阅了《江津县志》《江津军事志》，发现志书与英名录记载一致，谜团未能解开。

我们寻找了一个月，终于有所发现：在破损的《洞塘乡志》“烈士名录”中，有“邹开文原名胡秉文”的记载。

为何烈士有两个名字？我们将信息反馈给李市镇，辗转得到邹开文烈士亲属电话，但多次拨打，均无法接通，疑云再生。



革命烈士证明书

我们来到江津区档案馆，查到了原版烈士名册，发现胡炳文的性别一栏赫然标注为“女”。此前所有资料均未标注性别，按照资料的书写习惯，凡姓名后未标明性别者均为男性。在江津1000余名烈士中，仅有几位女性，抗美援朝牺牲的女烈士目前更是仅知两位，难道江津还有一位女烈士吗？

为追寻真相，我们联系了李市镇的相关领导，再联系到洞塘村干部刘富航，获得了关键证据——胡炳文烈士的三等功喜报和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照片。随后了解到，胡炳文幼年时随改嫁的母亲到邹家生活，继父为她取名“邹开文”。她的兄弟邹开焱也证实：“她是我同母异父的姐姐。”

我们又联系了几江街道机关干部龚

卫，并到胡秉文烈士的同父异母之弟胡宗英家中，查看了胡秉文烈士的相关资料。经实地核查、反复甄别和资料比对，谜团终于被揭开：几江街道的胡秉文与李市镇的胡炳文为同一人！

原来，当年史料记录均为手写，再加上录写者文化程度有限，最终导致同音字“炳”与“秉”的误记。此外，家庭变故导致了姓名重叠，使这位女烈士的真实身份被尘封70多年。

解开这段历史谜团后，我们怀着对烈士的无比敬仰，在《江津烈士英名录》上郑重写下：胡炳文（又名胡秉文、邹开文），女，生于1930年11月，江津区李市镇洞塘村（原四川省江津县洞塘公社中华二队）人。1950年8月参加工作，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后勤治疗所见习护士。1952年9月6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，荣立三等功一次。安葬于朝鲜江原道淮阳里第309号烈士陵园。1954年11月15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政治部批准其为烈士。

至此，江津区第三位抗美援朝牺牲的女烈士，终于以完整的面貌被载入史册。这不仅是对烈士英魂的告慰，更让我们在文字考据的细微处，触摸到历史背后真实的人生轨迹与家国情怀。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当世界充满迂回

——《直道》的精神困境与叙事启示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朱思婧

在这个推崇圆融、鼓励变通的时代，“直道”二字本身就构成了对沉默的挑战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直道》（作者鹿远），恰逢其时地出现在读者面前。它并非又一部《官场现形记》或成功学指南，而是一次关于精神选择的深度探索，一部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寓言。

1 迷途中的坚守： 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

《直道》的独特价值，首先体现在它对精神困境的深度挖掘上。小说细致勾勒了主人公师鲁直从纯真书斋步入现实洪流，在体制迷宫中艰难跋涉的漫长轨迹。从“跟车卖票”的起点开始，这个先是在乡村中学教书、后又莫名其妙考入县委宣传部的知识分子，不得不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公路上往返奔波，这一设定本身就暗示了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挫败。这种开场既是对传统成长小说浪漫色彩的消解，也是对现实复杂性的坦诚面对。

小说通过师鲁直从宣传部到报社，再到市委办公厅，最终成为副市长的人生轨迹，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精神试验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并没有塑造一个完美的道德英雄，而是通过主人公在具体事务中因坚持原则而遭遇的困境，展现坚持原则所引发的复杂涟漪。在鹿角镇的环境污染报道风波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环保主义者的正义呼喊，更是一个在师恩情谊与事实正义间艰难抉择的普通人；在财政局的改革中，展现的不仅是改革者的魄力，更是体制内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对个体选择的制约；在副市长任上对矿山的整治，呈现的不仅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，更是生命威胁下的人性考验。

这些情节的展开，始终围绕着那些被伤害的人际关系、被牺牲的个人利益，以及内心深处不时涌上来的自我怀疑。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叙事的诚实内核，让我们看到选择正直不仅需要对抗外部的压力，更需要克服内心的动摇。当师鲁直面对水泥厂污染

问题时，在事实正义与师恩情谊之间的艰难抉择，展现了道德困境的复杂性。这种叙事选择使得小说摆脱了廉价的道德说教，转而进入更为深刻的人性探索领域。

2 克制中的力量： 叙事艺术的精神勘测

鹿远在叙事艺术上的创新构成了这部小说最为迷人的特质。他放弃了戏剧化的情节转折，转而采用一种近乎地质勘探般的耐心，将主人公置于家庭责任、同僚压力与理想追求的持久角力之中。这种朴素而克制的写作风格，与小说主题形成了美妙的呼应——真正的勇气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，而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具体坚持中。

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人称转换——从“我”到“他”的无缝链接，不仅是一种叙事技巧的创新，更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分析方法。当师鲁直在灯红酒绿后痛斥自己“一旦失控，真的就是猪狗”时，这种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的转换，实现了自省与审视的双重效果。这种叙事策略让人联想到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“间离效果”，却又超越了单纯的戏剧理论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。读者在代入人物情感体验的同时，又被强制保持一定的思考距离，这种双重视角的交替使得阅读过程成了一场精神历练。

小说中的时空交错手法同样值得关注。来自师家湾的乡村记忆、三爷爷的传奇故事、母亲的苦难经历——这些过往片段以意识流的方式不断闯入现时叙事，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，更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时间结构。这种叙事方式使得个人的命运与家族的历史、时代的变迁形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，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。

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，正是那些主人公为“直道”付出代价的时刻：可能是一次关键的晋升因不愿妥协而失之交臂，也可能是一段珍贵的情谊因立场分明而渐行渐远。在矿山整治事件中，这种代价达到了顶峰——不仅是职业风险，更是生命威胁。这些场景没有悲情的渲染，却有着刺

骨的真实感。作者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叙事姿态，避免情感泛滥，这种克制反而强化了作品的文学感染力。它告诉我们，选择正直不是一种姿态，而是一连串具体而微的放弃与坚守。

3 古今间的回响： 直道精神的当代映照

师鲁直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深厚的文化谱系。从进士及第、入翰林五年、正接了圣旨要外放京畿知县却卷入“戊戌变法”回到师家湾的祖爷爷所亲书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到墓碑文字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”，再到詹老师早年灌输的“横渠四句”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，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不是简单的符号堆砌，而是构成了人物行动的内在逻辑。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，让这些文化基因在当代语境中重新焕发生命力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。

小说中构建的古今对话场域具有特别的文学价值。当师鲁直面临困境时，苏轼的“不取巧”、白居易的“永不认输”、范仲淹的“先忧后乐”等先贤精神品质，不是作为教条出现，而是作为鲜活的精神资源参与到现在的叙事中。这种叙事策略既避免了文化展示的生硬，又实现了传统精神的当代转化。

与此同时，作者也没有忽视民间精神资源的重要性。师鲁直的草根出身和乡村记忆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另一个维度。来自师家湾的乡土情怀、三爷爷身上那种未经雕琢的血性和斗争精神、母亲苦难经历中蕴含的生命韧性——这些来自民间的精神资源，与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和对话，共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、有血有肉的精神世界。

4 存在的叩问： 直道精神的当代价值

《直道》最终指向一个深刻的命题：我

们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保持自我完整？作者没有给出廉价的答案，但他通过笔下的世界让我们看到，每个人坚守的“直道”，都是照亮这个模糊时代的一束光。《直道》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。

它提醒我们：在一个人人精于计算的年代，那些选择遵循内心准则生活的人或许才是真正的智者；在一个普遍认同“曲线救国”的社会里，保持笔直需要非凡的清醒与定力。

在师鲁直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坚守，更是一种在复杂现实中保持精神独立的可能性。这种可能性不是建立在简单的道德优越感之上，而是源于对生活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和对自己选择的清醒认知。当55岁的师鲁直决定提前退休时，这不是简单的退却，而是对“直道”理解的升华——坚守原则不仅需要勇往直前的勇气，也需要懂得适时退出的智慧。这种对“直道”内涵的丰富和深化，使得作品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说教，进入了更为深邃的生命哲学领域。

这或许就是文学最珍贵的功能——它不是为我们提供答案，而是唤醒我们提出问题、直面生活的勇气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直道》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官场小说，成为一部关于当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刻寓言。它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充满迂回的世界里，“直道”不仅是一种选择，更是一种能力，一种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、坚守内心的能力。